

语言能力与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长沙10所高职院校的调查数据

罗忠勇¹, 龙国莲²

(1.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2.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文法系,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 基于长沙10所高职院校2009届568名毕业生的实证调查数据考察了语言习得与职业地位获得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学英语四六级水平和专业英语四级和八级水平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后的工资有显著性影响,但英语三级水平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后的工资均没有显著性影响;普通话水平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有显著性影响,但普通话水平对已就业的毕业生的工资没有显著性影响;会讲学校所在城市方言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找工作没有较明显的帮助,但对已就业毕业生的工资却有较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 大学生; 语言能力; 职业地位; 高等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0)02-0079-05

A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occupation status acquisition: set 10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angsha as example

LUO Zhong-yong¹, LONG Guo-lian²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Department of Secretary and Law,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occupation status acquisition based on an empirical survey on 568 students who graduated in 2009 from 10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angsha. The conclusions indicates that the level of CET-4, CET-6, CSET-4 and CSET-8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employment and wage of the graduates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but the level of CET-3 has no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t; The level of mandarin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ndividual employment of the graduates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but it has no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wage; Being able to speaking dialect of the city where the schools locate has no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getting jobs, but it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wage of the graduates who have obtained occupatio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linguistic capacity; occupation statu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现,也是人际沟通的媒介和工具,因而也是人们进入社会、摄取资源以及获得社会结构地位的最基本也是很重要的技能。国家很重视对在校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培养,不仅将语言教学纳入其教学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而且对

不同层次学校学生的语言习得能力及其结果做了一些刚性的规定。例如,在许多大学就规定,大学本科必须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才能毕业,专科生必须通过大学英语三级考试方能毕业,师范生的普通话水平要达到二级乙等才能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另有一些地区招考公务员、企业招聘员工对普通话水平和英语水平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甚至有些单位还对是否熟悉本地方言有一定要求。可见,语言习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着人们获取经济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也因此影响其在社会

收稿日期: 2010-03-05

作者简介: 罗忠勇(1972),男,湖南新化人,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教育与社会分层。

结构中的地位。然而,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很少见到有关于语言能力对人们市场能力和机会影响的经验研究,学界更多的是关注语言习得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提高语言习得能力等问题^[1-6],或者是,较空泛地谈论语言习得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7-9]。

以往的一些研究者从多种角度探讨语言习得的影响因素,探索提高语言习得能力和方法和途径,以及国家在文凭发放和职业资格认定中明确规定语言习得能力的条件,其中暗含了一个前提,即语言习得能力对人们市场能力和机会的获得,即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有重大影响。语言习得能力对人们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或对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到底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呢?这一问题很少有研究去检验。

高职院校主要培养应用型和操作型的专业技术人才,作为最基本的工作技能的语言及其能力,在高职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理应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其毕业后求职过程和工作经历中也应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语言习得能力在现实的高职生就业市场上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往的研究文献没有提供经验性的解答,然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将直接考量高职院校的语言教学工作的合法性,也将决定其未来语言教学工作的走向。为此,笔者利用来自长沙 10 所高职院校 2009 届共 568 名毕业生的实证调查数据来分析语言习得能力与高职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笔者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2009 年 7-8 月对长沙 10 所高职院校 2009 届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样本抽取的具体方法是:首先从长沙市 30 余所高职院校中随机抽取 10 所高职院校,然后在被抽中的学校随机抽取 3 个系,再后在被抽取的系随机抽取 25 名毕业生,最后获得一个共包括 750 名毕业生的随机样本。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向这 750 名毕业生发放问卷,最后收回有效问卷 568 份,样本有效回收

率为 76%。样本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样本基本分布情况 %

| 变量 | 百分比 | 变量 | 百分比 |
|------------|---------|--------------|---------|
| 性别 | | 英语等级 | |
| 男性 | 56 | 专业八级 | 0.6 |
| 女性 | 44 | 专业四级 | 2.5 |
| | (N=568) | 大学英语六级 | 7.8 |
| 专业 | | 大学英语四级 | 24.2 |
| 文史 | 36 | 大学英语三级 | 60.5 |
| 理工 | 56 | 未过级 | 4.4 |
| 艺术 | 8 | | (N=556) |
| | (N=568) | 普通话水平 | |
| 政治面貌 | | 二级甲等以上 | 12 |
| 中共党员 | 15 | 二级甲等 | 23 |
| 非中共党员 | 85 | 二级乙等 | 37 |
| | (N=565) | 三级甲等 | 10 |
| 干部身份 | | 三级乙等 | 7 |
| 学生干部 | 24 | 没过级 | 11 |
| 非学生干部 | 76 | | (N=554) |
| | (N=568) | 普通话课程平均成绩/分 | 82 |
| 学习成绩排名 | | | (N=559) |
| 上等 | 18 | 学校所在城市方言熟悉程度 | |
| 中上等 | 27 | 会讲 | 14 |
| 中等 | 40 | 不会讲 | 86 |
| 中下等 | 12 | | (N=568) |
| 下等 | 3 | 是否找到工作 | |
| | (N=560) | 找到了 | 76 |
| 学校类别 | | 还没找到 | 24 |
| 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 | 10 | | (N=568) |
| 非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 | 90 | 平均工资/元 | 1 875 |
| | (N=567) | | (N=475) |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文中的因变量是“职业地位获得”,用“是否找到工作”和“平均月工资”两个指标来测量。“是否找到工作”是一个二分变量(“找到了”=1,“没找到”=0),平均月工资在模型中取自然对数。

(2) 自变量。文中的自变量是“语言习得”,它涉及的是语言习得能力及其结果,我们用“英语水平”、“普通话水平”和“熟悉学校所在

城市方言程度”等三个指标来测量。“英语水平”分为专业八级、专业四级、大学英语六级、大学英语四级、大学英语三级和未过级等6类,以未过级为参照;“普通话水平”分为二级甲等以上、二级甲等、二级乙等、三级甲等、三级乙等和未过级等6类,以未过级为参照;普通话水平还采用了普通话课程分数这一测量指标;“熟悉学校所在城市方言程度”是一个二分变量(“会讲”=1,“不会讲”=0)。

(3) 控制变量。文中的控制变量有性别、专业类型、政治面貌、干部身份、学习成绩班级排名、学校类别等。性别为类别变量(男性=1,女性=0);专业类型分为文史、理工和艺术3类,以文史为参照;政治面貌为二分变量(中共党员=1,非中共党员=0);干部身份为二分变量(担任过干部=1,没担任过干部=0);学习成绩班级排名分为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和下等5类,以下等为参照;学校类别为二分变量(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1,非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0)。

(三) 统计方法

文中使用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样本各变量的分布,用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多元统计方法分析英语水平、普通话水平和方言熟悉程度等自变量对是否找到工作和月工资等因变量的影响。所用统计软件为stata.9.0。

三、结果分析

表2列出了根据最大似然法和最小二乘法估算出的有关高职院校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两个多元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是以毕业生是否找到工作为因变量,以其英语水平、普通话水平、普通话课程成绩、是否会讲学校所在城市方言为自变量,控制性别、专业、党员身份、干部身份、学习成绩和学校类型等变量建立的logit回归模型;模型2是已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的月工资对上述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一) 语言能力对找工作的影响

从模型1可以看到,英语水平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找工作有一定影响。具体来看,通过大学英语四

级考试的高职院校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机率(即找到工作与没找到工作相比)是没有通过任何英语等级考试的毕业生的1.2倍($p < 0.1$)。取得大学英语六级、专业英语四级和专业八级证书的高职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机率分别是没有任何英语等级证书的毕业生的1.2倍($p < 0.05$)、2.6倍($p < 0.001$)和3.1倍($p < 0.001$),而通过大学英语三级考试的高职毕业生和没有通过任何英语等级考试的毕业生在找工作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这给出了一个信号,即仅仅通过大学英语三级考试对找工作没有明显帮助,用人单位认可的只是大学英语四、六级和专业英语四级和八级证书。

普通话水平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找工作也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却比专业英语要小得多。具体来看,普通话水平为二级乙等的高职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机率是普通话没有过任何等级的毕业生的1.201倍($p < 0.1$),普通话水平为二级甲等和二级甲等以上的高职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机率分别是普通话没有过任何级的毕业生的1.213倍($p < 0.01$)和1.213倍($p < 0.001$),而普通话水平为三级甲等和三级乙等的高职毕业生在找到工作的机率上与普通话没有过任何级的毕业生没有显著差异。从这里可以看到,普通话水平为二级乙等、二级甲等和二级甲等以上这三个水平等级对找工作的影响没什么差异,它们对学生就业的贡献几乎均为普通话没有达到任何级别的1.2倍。普通话水平对高职毕业生找工作影响的区分点是在二级乙等,也就是说,二级乙等以上的普通话水平相对于二级乙等以下有一定优势,普通话水平越高,找到工作的机率越大;另外,普通话课程成绩对高职学生找工作也有较显著影响。

模型1显示,学生会不会讲学校所在城市方言对能否就业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控制变量中,性别、专业和干部身份都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找工作有显著性影响,即男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机率是女生的1.5倍,理工、艺术类专业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机率分别是文史类毕业生的1.17倍和1.21倍,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机率是普通毕业

生的1.14倍。

表2 职业地位对语言习得的多元回归模型

| 变量 | 模型1(发生比) | 模型2(回归系数) |
|----------------|----------------------|----------------------|
| 自变量 | | |
| 英语水平 a | | |
| 大学英语三级 | 1.024 | 0.017 |
| 大学英语四级 | 1.156 [*] | 0.023 [*] |
| 大学英语六级 | 1.164 [*] | 0.043 [*] |
| 专业四级 | 2.571 ^{***} | 0.147 ^{***} |
| 专业八级 | 3.138 ^{***} | 0.216 ^{***} |
| 普通话水平 b | | |
| 三级乙等 | 0.683 | -0.019 |
| 三级甲等 | 1.026 | 0.027 |
| 二级乙等 | 1.201 [*] | 0.048 |
| 二级甲等 | 1.213 ^{**} | 0.051 |
| 二级甲等以上 | 1.213 ^{***} | 0.063 |
| 普通话课程分数 | 1.002 [*] | 0.037 |
| 会讲学校所在城市方言 c | 1.219 | 0.072 [*] |
| 控制变量 | | |
| 性别 d | 1.468 ^{***} | 0.184 ^{***} |
| 专业 e | | |
| 理工 | 1.173 [*] | 0.038 |
| 艺术 | 1.209 ^{**} | 0.041 [*] |
| 中共党员 f | 1.026 | 0.061 [*] |
| 学生干部 g | 1.143 [*] | 0.028 |
| 学习成绩 | 0.836 | -0.036 |
| 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 h | 1.065 | 0.029 |
| 模型其他值 | | |
| 截距 | | 2.183 ^{***} |
| R ² | 0.071 | 0.207 |
| N | 550 | 475 |

注：a 以未过级为参照，b 以未过级为参照，c 以不会讲为参照，d 以女性为参照，e 以文史为参照，f 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g 以非学生干部为参照，h 以非全国示范性高职院校为参照

显著性水平：^{*}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二) 语言能力对工资的影响

从模型2可以看到，英语水平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工资有显著性影响。与没有通过任何英语等级考试的毕业生相比，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的毕业生的月工资高2.3% ($1 - e^{-0.023}$)，而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的毕业生的月工资分别比没有通过任何英语等级考试的毕业生高4.4% ($1 - e^{-0.043}$)、15.8% ($1 - e^{-0.147}$)和24.1% ($1 - e^{-0.216}$)。也就是

说，有大学英语四级、大学英语六级、专业英语四级和八级合格证的毕业生的月均工资分别比没有任何英语等级考试证的毕业生高43.2元 ($1875 \times 2.3\%$)、82.5元、296.3元和451.9元。工资收入差距大的原因，可能是过了英语等级考试的毕业生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良好的专业素质找到了一些比较好的单位和职业而获得了较高的工资收入。模型2还显示，过大学英语三级的毕业生在月均工资上与没有通过任何英语等级考试的毕业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模型2还可以看到，普通话水平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月均工资没有显著性影响，但是，会讲学校所在城市方言对毕业生的月均工资有较显著影响。与不会讲学校所在城市方言的毕业生相比，会讲学校所在城市方言的毕业生的月均工资高7.5% ($1 - e^{-0.072}$)。其原因可能是，高职院校毕业生中有相当部分在学校所在城市就业，能讲该城市方言可能有助于其开展业务，并创造出更大的业绩，相应地获得更多的工资回报。

模型2还显示，控制变量中的性别、专业和党员身份对毕业生的月均工资有较显著的影响。其中，男生的月均工资比女生高20% ($1 - e^{-0.184}$)，艺术类专业毕业生的月均工资比文史类专业毕业生高4.2% ($1 - e^{-0.041}$)，中共党员毕业生的月均工资比非中共党员毕业生高6.3% ($1 - e^{-0.061}$)。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英语水平与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呈显著性相关。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有助于提高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的机率，虽然大学英语四级和六级合格证对就业的影响差异不大；通过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能大大提高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通过大学英语三级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没有显著性影响。

英语水平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英语水平越高，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也越高。其中，专业英语四级和八级水平对毕业生工资的影响远高于大学英语四六级水平，但大学英语三

级水平对毕业生的工资没有显著性影响。

普通话水平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也有较显著的影响,普通话水平为二级乙等以上的毕业生在找工作上有一定优势。但普通话水平对已就业的毕业生的工资没有显著性影响。

能否使用学校所在城市方言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找工作没有较明显的影响,但对已就业毕业生的工资却有较显著的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为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语言教学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即高职院校的语言教学是必要的,它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在表达和人际沟通方面的基本技能,还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和毕业后的事业发展,即影响其市场能力和机会的获得(即职业地位的获得)。这些研究结论至少可给高职院校的语言教学工作如下几点启示:

首先,高职院校在加强基本英语教学工作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提升英语教学的层次,鼓励学生参加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英语专业的学生,要鼓励甚至要求他们参加并通过专业英语四级或八级考试。英语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学生不仅可以获得更多就业机会,还可以在未来的工作中得到更多回报。

其次,高职院校应进一步重视普通话教学,把普通话二级乙等作为考核学生的一项基本要求,以增加学生就业的筹码。在现代社会,用人单位对应聘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它们不仅要求求职者有良好的专业技术水平,还要求他们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以较标准的普通话为基础的口头表达能

力有助于单位员工去全国各地开拓市场。

最后,语言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在课余有意识和策略性地学习各种方言,这可增加未来事业成功的机会。方言学习对学校普通话教学不一定是一种阻力和抗拒,但却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并且有利于学生在语言多样性的条件下提高语言学习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张思武. 论心理语言学的第二语言习得心理机理假设的意义[J]. 外国语文, 2009(3): 121-127.
- [2] 李 俏. 语言习得中的学习自主性及其在英语教学实践中的培养[J]. 课程教材教法, 2007(11): 51-56.
- [3] 孙晓明. 国内外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研究综述[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4): 54-62.
- [4] 姜 孟. 第二语言词汇习得形式——意义映射: 争议与思考[J]. 当代语言学, 2007(1): 52-67.
- [5] 杨彩梅. 从寄生语缺知识的调查结果看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及语言的共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3): 196-204.
- [6] 李 平. 语言习得的联想主义模式[J]. 当代语言学, 2002(3): 164-175.
- [7] 戴中明. 浅谈大学英语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J]. 外语界, 2001(3): 32-36.
- [8] 李键仓. 谈语言习得理论对转变外语弱势生的作用[J]. 教育与职业, 2004(20): 15-16.
- [9] 田 星. 论雅各布森的语言艺术功能观[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6): 13-16.

责任编辑: 曾凡盛